
呐喊与回响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思想与艺术

陈岸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与回响: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思想与艺术/陈岸峰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6

ISBN 978-7-302-58323-3

I. ①呐… II. ①陈…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②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5001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晓华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11.25 字 数:159 千字

版 次:202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88412-01

本书出版得到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特此鸣谢!

目录

第一章 启蒙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1
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
二、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	3
三、小说救国	6
四、鲁迅的呐喊与回响	8
五、武侠与启蒙	13
六、知识分子的被/再启蒙	19
七、章节安排	20
第二章 启蒙之光，中日互动：鲁迅与日本的文学因缘 ...	22
一、前言	22
二、留日期间的革命行动	22
三、国民性的思考	24
四、日本学界对鲁迅著作的译介	29
五、鲁迅译介的日本文学与思想	34
六、日本文学与鲁迅小说	36
七、结语	38
第三章 冲决铁屋，叩问“魂灵”：鲁迅《祝福》中的	
三重世界及自我叩问	39
一、前言	39

二、《祝福》中三重世界及其递变的位置	39
三、“魂灵”叩问	47
四、吊诡的“祝福”	49
五、启蒙与被启蒙	50
六、自我叩问	53
七、结语	54
 第四章 众人皆醉，独醒何用：老舍《断魂枪》的艺术及觉悟	56
一、前言	56
二、人物	57
三、语言	59
四、情节	61
五、地方风俗特色	63
六、思想	64
七、结语	65
 第五章 末世苍凉，情爱角逐：张爱玲“小”说的家庭专制及其颠覆	67
一、前言	67
二、“乱世”与“小”说崛起的关系	67
三、“小”说与细节描写	71
四、乱世中情爱的角逐	77
五、所谓“倾国倾城”	84
六、“小”说与启蒙	86
七、结语	87
 第六章 经典移植，阐扬传统：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型结构”及启蒙传承	88
一、西潮的冲击及其影响	88
二、“隐型结构”的定义	89
三、“隐型结构”三重奏	92

四、历史时空的传承结构	108
五、移植与创造	110
六、启蒙传承	110
七、结语	113
第七章 追溯传统，批判当下：寻根小说的理念及其省思	114
一、前言	114
二、寻根小说的崛起背景	114
三、寻根派的“寻根”理念及其反响	116
四、民间神话与当代神话的紧张关系	126
五、作为启蒙者的知青与传统的冲突	131
六、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的冲突	134
七、结语	138
第八章 直面现实，一地鸡毛：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再启蒙	139
一、前言	139
二、新写实小说的崛起背景	139
三、三种新写实小说的选本	142
四、乌托邦想象的幻灭及其影响	146
五、新写实小说内涵阐释	152
六、知识分子的无措	157
七、结语	159
第九章 总结	161
参考文献	163
后记：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	169

第一章 启蒙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寻觅良策以化解危机，朝野沸腾，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864年江苏巡抚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李鸿章奏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其时，李鸿章尚未踏出国门，此说可见其对中西实力之别仍有所不知，或乃顾及朝廷尊严，只挑武器而不及其他根本性问题。因为，无论是镇压内乱或抗击外敌，当下最急需的便是魏源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进口最先进的西方列强的武器。然而，八年之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他在上奏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即有了思想上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

著名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说，即首出于此。1874年12月，直隶总督及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给光绪的《筹议海防折》中再次提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③

① [清]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25卷，第9页。

② [清] 李鸿章著，顾廷龙编：《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卷，第107页。

③ [清] 李鸿章著，顾廷龙编：《李鸿章全集》，第6卷，第159页。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谓无三不成数，其前后观念一致。追随过曾国藩及左宗棠的地方大员杨昌濬称：

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①

大臣王文韶亦奏曰：

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②

由宗室爱新觉罗·世铎领衔、在京官员联名的奏折亦谈道：“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③“千古未有之局”“亘古所未有”“千古未有之变局”均为附和李鸿章“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说的同调，颇有诸葛亮《前出师表》中“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意思，当然其严重性绝对超过偏安一隅的蜀国，此话延伸至当下，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乃当时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又因为是李鸿章最早提出且其身居显要，故历史上均以此名言划归其所发。身处迷局之中，往往令人看不清问题的关键和本质。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挫败后的深刻反思、游历欧美后开阔的眼界，令李鸿章等主持洋务运动的大臣及部分士大夫，能站在潮头浪尖上思考时政。

道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开明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危机，积极探寻自强之路。这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所指出的现象：

自 1861 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④

① [清]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99 卷，第 34 页。

② [清]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99 卷，第 52 页。

③ [清] 世铎：《奏为遵旨会议筹办海防等情事（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9381-015。

④ [美]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1 页。

以曾国藩、李鸿章及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聚集了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轰轰烈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而自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之后，“自强”也变为“救亡”，即既向西方技术学习，同时也展开对国民的思想启蒙，这正是晚清思想风云激荡的核心体现。由“民族”到“国家”，再到“国民”，为启蒙思潮的根本观念，与此同时，也建构了思想启蒙的话语体系。启蒙话语，是二十世纪小说创作的主流思想。而真正的产生启蒙的“呐喊”者，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的鲁迅所创作的小说，其作用巨大，影响至今，回响仍在。

二、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

十七世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学派哲学家最早用“lumières-naturelle”（自然之光）来区别于“lumièreslèvelée”（神启之光）。^①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企图是把知识之光照耀到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用理性取代神灵。德语用 Aufklärung 一词表述“启蒙”，词意明确。英语一般用 Enlightenment 这个动名词来表述启蒙与启蒙运动，^② 但这个词直到十九世纪才成为通用术语。日语首先使用“启蒙”（けいもう），中国学者便从日语引进“启蒙”这个术语。汉语中早有“启蒙”一词，古人把入门的书称为“启蒙”。^③ “启蒙”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理性”，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是一个“理性自由时代”。然而，这种“理性”与“自由”，到了“中世纪”，却因为基督教会而被掩盖，那就是“理性被禁锢”的“中世纪”。

“启蒙”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一般与思想运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启蒙运动”。在西方，是指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一场反

① 笛卡儿学派，指的是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由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发展成的两个不同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的机械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勒卢阿、J. 拉美特利、卡巴尼斯等，他们发挥了笛卡儿物理学中的唯物论思想，肯定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并进而认为精神是物质的属性，心灵不能脱离肉体而存在，而在认识论上则认为认识只是对外界事物消极、直观、机械的反映。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和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海林克斯和马勒伯朗士，竭力宣传关于理性和信仰一致的学术。

② 启蒙运动（Aufklärung）亦称“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注释。

③ 张芝联：《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东方文化》，2001年第5期，第69~73页。

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而在中国，主要有三次：一、戊戌维新；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新时期思想解放和八十年代新启蒙。

晚清的思想启蒙主要是指戊戌维新前后的思想启蒙，其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内涵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反对专制、迷信、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费正清指出：

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①

启蒙思潮作为晚清主流的文化思潮，几乎遍及晚清社会的各个领域，尤以政治、教育、新闻传播、文学等领域为突出。在政治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学说，邹容、陈天华等的革命学说，主要积极宣扬思想启蒙。在教育方面，兴办学堂、编辑启蒙教材，鼓励人人识字，开启民智。如当时湖南、安徽、直隶等地创办的“半日学堂”，高步瀛、陈宝泉编的《国民必读》，推行国民教育，旨在开启民智。在新闻传播方面，大量创办近代报刊，如《教育杂志》《大公报》《新民丛报》《清议报》《浙江潮》等，均注重思想启蒙。李伯元在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其中的《游戏报》为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影响甚大。其办报的目的则在于接近民众，启蒙民众。李伯元“打算到上海去办报，并想从游戏入手，以便于接近民众”。^② 吴趼人亦与梁启超合作编写《新小说》，积极为报刊撰稿。其作品多发表于当时的日报《新小说》《月月小说》《指南报》等，主要有小说、小品文，其目的也在于启蒙民众。

此际，在野文人在新兴的报刊上，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民间议政与批判，堪称轰轰烈烈。茂苑惜秋生在《糊涂世界·序》中，对当时的朝野士大夫作出如此猛烈批判：

① [美]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6 页。

② 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0 页。

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后乘之载刍灵，若当场之弄木偶。下者为野，不为鹿豕，即为豚鱼。与谈兴废，犹考钟鼓以享爰居；与论治乱，犹取仁义以教禽兽。^①

“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与“犹取仁义以教禽兽”两句，充分描绘了“所谓贤士大夫”的虚伪与无能，这是赤裸裸的揭发。欧阳钺源与别人合作的两种小说中，其中一种便名为《维新梦》，可见其关心所在。著名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的自评中说：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其睡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②

其《老残游记》所未能描绘的“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不就是日后鲁迅小说中的现象？刘鹗自述其《老残游记》乃为身世、家国、社会、种教之哭泣：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③

“感情”之说，可谓声嘶力竭的呼告，“棋局已残”则是智者的洞烛先机。刘鹗《老残游记》、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曾朴《孽海花》这些“谴责小说”，主要都是描写官场的黑暗。鲁迅先生对“谴责小说”有深刻的认识与赞赏：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

①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②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③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73页。

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①

“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正在于内忧外患的现实所激起的有识之士的救世之心。鲁迅的小说，其实也正是在“谴责小说”的基础上，作更具体而纵深的开拓，其笔下人物皆为“啜茗听平逆武功”的暗昧细民，根本不知国家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启蒙，除了扫除迷信及一切不人道的压迫之外，最终的觉悟必然是推翻阻碍自由、民主的帝制。而当时的清廷之腐朽无能，正是导致中国沉沦且阻碍人民自救的主要障碍。这便是从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更多的仁人志士更倾向革命的关键所在。

三、小说救国

“国民”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与其相关的启蒙话语更为繁复，典型话语主要有：“国民”“新民”“民智”“民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例如，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就是要培养具有公德、国家思想及自由等民主特征的“新”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对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急迫呼唤。其《译印政治小说序》则大力推崇政治小说，宣扬政治小说的“新民”作用，指出“小说为国民之魂”^②，旨在借用小说以“新”国民之灵魂。梁启超把小说喻为“文学之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③视小说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必需的启蒙工具。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立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序言中，针对小说与革命的关系写下以下的著名宣言：

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世道。^④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册，第35页。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50页。

④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50页。

梁启超的革命思想在此期间达至巅峰，发表于1899年10月15日《破坏主义》，与1901年6月16日、7月6日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两篇文章便是明证：前者道出破坏一切以便重建的迫切性，后者认为对于颓败腐朽的旧中国而言，“破坏”亦是一种“德”。

严复与夏曾佑合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征引生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以阐发小说吸引人心的内在因素，^①从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角度，阐述了小说的重要性，指出小说亦有不断变革之必要，小说变革的本原在于人类的“公性情”。^②杨义指出小说与启蒙的关系：

近代小说观的崛起、深入、蜕变和逆转，为时代发展所决定，又与近代启蒙主义的盛衰沉浮息息相关。^③

吴趼人指出小说是可以宣传各种拯救国家的思想的途径：

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④

天僊生则指出，要救国则必先从改良小说与撰写小说着手：

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⑤

《〈绣像小说〉缘起》中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⑥谈虎客（韩孔广）则认为，专制政体是一切腐败混乱事情之总根源，严重束缚了国民的

①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是指由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必遭受灭亡的命运，其代表人物为斯宾塞。此学说由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介绍进中国，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的进化论部分。

②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页。

③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④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5页。

⑤ [清]天僊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1907年（第9号），第1~4页。

⑥ 商务印书馆主人：《启事》，《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1903年第1号。

思想：

天下种种腐败混乱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从专制政体生出来。

譬如身上被绳子捆了几十度，这专制政体就是根总绳，要把他割断，则其余不解自去；若留着他，便解一百天还解不脱哩。^①

国家政体的专制还是家庭专制，均会使国民的奴性日益严重化，这是思想启蒙最难以根除的奴性劣根。在晚清的启蒙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两种主要文学形态：一是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② 蔡元培的《新年梦》、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为代表的政治小说所体现出的精英启蒙形态；另一类是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民间启蒙形态。

四、鲁迅的呐喊与回响

梁启超与其志同道合者的这些激进的姿态，引起了“五四”一辈那些文学的改良/革命论者的共鸣，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鲁迅的小说实践《呐喊》。

可以说，李鸿章奏折上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乃政治上的“呐喊”，而文坛上借小说而作“呐喊”的是鲁迅。在国族衰颓的年代，鲁迅以《呐喊》与《彷徨》两本小说集揭开现代小说的序幕。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同时也始终是一个启蒙者”。^③ “五四”是一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形成了激烈的怀疑和否定：

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④

① [清]谈虎客：《东欧女豪杰》，《新小说》，1902年第2号，第20~46页。

② 梁启超本来的计划是写一套三部曲来讨论中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旧中国未来记》描述一个不求改变的中国所必然面临的灾难，《新桃源》描述一群被流放的华人如何于两百年前在一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又如何帮助他们的同胞重建中国。然而，梁启超的这套“三部曲”并没有完成，《新中国未来记》也只写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

③ [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3页。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

此中难能可贵的是还包括自我批判：“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①“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②鲁迅批判传统，从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启蒙民智，以达到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目的。在鲁迅这里，启蒙也是上升到民族、国家危亡层面上。鲁迅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形成是在家庭教育、留日期间的学习感受、中日之间紧张的国际关系中逐渐形成的。鲁迅目睹了家庭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世态炎凉，父亲被庸医所误，使他深切体会了社会的沉疴朽败。传统社会于他而言，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③

彷徨于铁屋之前的他，既曾自我麻醉而拓古碑，也曾不甘寂寞而呐喊，可是他始终未能驱除内心的悲观，因为“革命尚未成功”。这种“革命尚未成功”的悲观意识而以不无调侃的语调作嘲讽，这可见于其大量的杂文，而其小说则更有深刻的描写。关于对革命神话的颠覆，鲁迅在《阿Q正传》中借着阿Q对革命的无知而丧命，从而对当时的革命之失败作出了最彻底的讽刺。阿Q在乡人心中乃一无赖、流氓甚至是白痴，因而常遭别人戏弄、欺负。阿Q后来借入城之机，得识革命之威，因此，冒认自己是革命党，想不到却因此而被枪毙。鲁迅所面对的是混沌纷乱的中国，他所亟于期待的是一个有为的新中心的建立。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只是海市蜃楼。作为一个启蒙者，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因为举目皆阿Q。对于国民愚昧、不知革命的真谛的可悲现象，他在《药》《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小说中继续有深入的发掘。直接师承于鲁迅或受到鲁迅创作间接影响的乡土小说，如鲁彦、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黎锦明、许杰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1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16页。

等，继续从方方面面揭示了农村的苦难、愚昧、衰败、落后，以及农民的愚昧而引致的种种悲剧。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和社会意义是发现了“人”，启蒙先驱们意识到独立自由的个体生命对推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热烈呼唤个性的解放。“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①，鲁迅《伤逝》中子君的呼声成为女性争取独立的时代宣言。巴金的《家》之所以一炮而红，至今仍拥有读者，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抓到了启蒙时代的关键词，“家”便是窒息个性的牢笼，冲出家庭，挣脱家长的束缚，再进一步便是参加革命，解放所有被压迫者。不止男性要离家出走，丁玲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离家出走的“娜拉”，其《在医院中》离开上海而前赴苏区的护士陆萍亦然。然而，鲁迅则预言：“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② 张爱玲《倾城之恋》算是对鲁迅“娜拉”预言的回应，离婚的白流苏是回来后又走出去了，但也只是与范柳原凑合过日子罢了。张爱玲是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女作家，作品不少，文字自成一家，且绝大多数均为描写上海破落家庭的男女情欲。在其笔下，女性不只是被压迫者，她们也沦为男权社会的帮凶。《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经历了长期的压抑导致人性的畸变，一旦获得权利，这种畸变心理便不可遏制地与她的报复欲望结合起来。她就像一个女巫般操控女儿的命运，又导致儿媳妇们的死亡，由此而揭示人性深处的黑暗。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评曰：

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③

鲁迅笔下的“鲁镇”，被张爱玲移植至都市的大家庭，愚昧与悲剧只是换了个城里的舞台而已。

鲁迅认为，立国必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④。对于鲁迅而言，重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112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59页。

③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3期。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要的是域外文明如何改变国民性，而“立人”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最主要的指标，还是看有无高度发展的健全的人文环境，能否让人享有充分的精神独立与自由。鲁迅《故乡》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回乡只是为了卖老屋和接家人进城，“我”不但没有任何启蒙的企图，甚至面对着迷信的闰土与变成霸悍愚妇的“豆腐西施”的种种行为手足无措。作为妇孺的母亲比我更深地了解闰土这些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乡民困苦的根源是社会外部造成的，并非单纯的只是知识分子所认为的精神愚昧。由此而循环，无法摆脱，闰土的小儿子水生的将来或许比闰土更不堪。鲁迅便曾对许广平说：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①

在鲁迅启蒙视野小说之下，童年温馨的“三味书屋”变为颓败的老屋，留下的是闰土、水生、豆腐西施、孔乙己、阿Q，还有半人半鬼的祥林嫂。

一如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回乡遭遇农民的故事模式，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的“我”，在回乡的路上碰见昔日曾弃“我”而投军人怀抱的“她”，却因一次意外在脸上留下伤疤而无法终成眷属。而此刻的“她”原来已嫁与一又聋又哑的男人。在临别前，“她丈夫”咿咿呀呀地对她比划一通。就在她送我到路口的高粱地边，她竟要求与“我”发生性行为。而故事却竟以“我”不知如何反应而告结束。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实际上是遥应鲁迅的《故乡》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主题。《故乡》中的“我”与昔日童年时代的伙伴闰土重逢时，惊觉彼此距离之远，不只是闰土的愚昧无知，而且闰土也自觉地不再与“我”称兄道弟，而称“我”为“老爷”。故事最终在浓浓的哀愁中结束，尽管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在末端时，仍不无牵强地加插了一些主观的良好愿望于下一代的话语。“我”根本无法解决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在此备受质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祝福》中的“我”，无法回答祥林嫂关于灵魂之有无的问题。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的“我”，亦是一知识分

^① 鲁迅：《致许广平（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32页。

子（大学讲师）回乡时，也同样惊讶地发现昔日喜欢过的女主角，现已今非昔比，当下所见乃一农妇，而且是相当不堪的农妇。她嫁了一个哑巴，生了三个同样是哑巴的儿子。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能说话的下一代，她竟然要求“我”与她发生性行为，以达到这一目的。这对于“我”来说，自然是一极大的震撼，而故事亦于此处戛然结束，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在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显然无法回答她的要求。此处值得咀嚼的是，《白狗秋千架》中是作为农民的她，主动提出要求启蒙者的基因注入其血统之中，帮助她的下一代“发声”。然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却根本没想到以自己的基因去改造一直自己所关心的愚昧与无知的农民。这里说她主动要求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将基因注入其家族中是有根据的，因为若不是看重“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好基因，她随便在农村中找一个健全的人与她发生性行为便可以了。此处是否暗示了农民要求启蒙的自觉？而“我”的不知所措，是否亦是对鲁迅以来关于知识分子亟于启蒙农民的一种质疑？这就不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指导、指责群众，而是需要有所付出，而这付出却是一种道德的考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种遗传基因的方法更直接、更有效？这使知识分子“我”陷于两难，一旦答应，即落入不道德；然而拒绝，这一启蒙的传统，即陷于崩溃，以往的呐喊与彷徨，实则可能也是惺惺作态，徒具姿态而已。说到底，对群众的批判，岂不正是知识分子的自高身价，准此而言，亦正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将群众与知识分子的距离拉开，判若泾渭。亦即是说，这一僵局，正是昔日鲁迅们所不曾设想到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一僵局，颠覆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肩负的启蒙责任，甚至是对整个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一种彻底的质疑。世纪之初的鲁迅乃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士姿态，以血的洗礼拯救国民的灵魂，革命烈士夏瑜的血成为病人争先购买的治病药引，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国民的血可以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定期出卖，更无奈的是，《现实一种》中的血迹在阳光下显得不太真实。^①

^① 余华：《现实一种》，李陀编：《中国实验小说选》，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2页。

五、武侠与启蒙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少国人由昔日的妄自尊大而陷入自卑情结，郁达夫《沉沦》中的中国留日学生，由于在日本备感祖国的羸弱，更深受日人歧视，因而大受打击，最后选择自沉，而在其将自沉前便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①与此同时，战败后的中国，却因救亡意识而侠风复炽。梁启超指出：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僵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②

此际已非“自强”，而是“救亡”。故此，“尊侠力，伸民权”^③成为一时风潮。章太炎在《儒侠》一文中指出：

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④

章太炎又在《变法箴言》进一步地对日本武侠作介绍：

至于书生剑客，慷慨国事，竞为诡激，横刀曰攘夷，摆铐曰脱藩，一言及尊攘，切齿扼腕，斥当轴为神奸，而笑悼老成宿儒之畏懦，悲歌舞剑，继以泣涕，展转相效，为一世风尚……卒使幕府归政，四邻不犯，变更法度，举错而定。^⑤

即是，日本的侠风，其力量大至可以干预政治，可作为中国借鉴，这是对当时流于空谈的中国士大夫的鞭策。1897 年，梁启超《记东侠》盛赞

①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香港：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 卷，第 53 页。

② 袁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九册，1899 年 3 月 22 日。

③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2 册，第 485 页。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册，第 439 页。

⑤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上册，第 19 页。

“日本以区区三岛”而使列强“莫敢藐视”，因而成为“真豪杰之国”，强国秘密在于“当时侠者”，成为社会民粹主流意志，“乃至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荆聂肩比，朱郭斗量。攘夷之刀，纵横于腰间；脱藩之袴，络绎于足下”，“而以侠为国之用”。^① 侠成为日本民间主流风气，梁启超对此高度赞扬。梁启超则对侠有以下定义：

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②

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他们重侠的宣言与主张，掀起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尚侠热潮。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如果不能实现变法，应任侠以有作为：

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③

谭嗣同的任侠之说，应该是受以兄弟相称并传授其武艺刀剑之法的大刀王五的影响。1898年9月27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被斩于宣武门外菜市口，王五得知后悲痛欲绝。为了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和复仇，王五多次组织人员进行暗杀满廷大员的活动，终未果。一代大侠王五，最终的结局却是于1900年10月25日，因参与义和团抗击外国入侵者而被枪杀。

1902年日本青年押川春浪写成《武侠之日本》，书写日本与美、俄两国的军事对峙，并将日本原有的“武士”升华为“武侠”。《武侠之日本》全书使用“武侠”一词达92次，书中诸如“武侠男儿”“武侠精神”“武侠团体”“武侠帝国”等话语，鼓吹武士道的复仇精神，曾避难至日本的梁启超，深受押川春浪《武侠之日本》将“武侠”转换为具有启蒙现代

① 梁启超：《记东侠》，《时务报》，1897年第39期。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20页。

③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性意义的民族自救道路的影响。蒋智由在为《中国之武士道》作的序指出：

虽然，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
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义，而适以所处之地位，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①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列举了16种武士道行为，其中近一半是表彰赴国之难。另一半是为民铲除不平。梁启超大力提倡“武侠”的“公武”精神，即泯除传统的莽夫的门户之见或私利恶斗，遂将传统侠义的附庸地位，提升至民族国家的启蒙现代性精神，以“中国之武士道”精神，冲击陈腐的社会风气，高度体现了启蒙的现代性。^②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即称：“中国民俗与欧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欧日尚武，中国右文是也。”^③梁启超又将武士精神提升至国力层次而指出：

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④

有署名“壮游”又在文中自称“金一”者，亦即金天翮，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称：

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愤，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概也。是故朱家、郭解、王公、剧孟侠也，荆轲、聂政、要离、仓海亦侠也，李膺、杜密、范滂、顾宪成、高攀龙亦侠也，富兰克林、哲尔

①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② 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及接触西学的整体情况可参见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hapter3,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hapter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24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5页。

生、丹顿、罗伯斯比、玛志尼、加里波的、噶苏士、巴枯宁、西乡隆盛、宫崎寅藏尤侠也。^①

由此，“武侠”的范围扩之古今中外，武夫与文人及政客以至于贩夫走卒，皆可为侠。

1915年12月，包天笑在《小说大观》第3期上首次对“武侠小说”进行类型命名，以当时已经盛名之下的林纾的文言短篇小说《傅眉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正式命名的“武侠小说”。1922年的一则广告声称：

吾国民气，萎靡不振，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振起精神、浚淪心胸之功用；吾国社会，奸诈谲伪，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增进阅历、辨别邪正之功用；吾国外侮，纷至沓来，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巩固民心、洗雪国耻之功用；吾国外债，日加无已，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激发慷慨、将以救国之功用。^②

1914年，平江不肖生在日本创作《留东外史》，特别插叙了“以武保国强种”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自1913年与1916年两次讨袁失败后，平江不肖生在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然而并未放弃武术事业。1922年，他应世界书局之邀而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其《江湖奇侠传》终于以“长篇武侠小说”面世。而具有启蒙意识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开篇，便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殉难写起。1927年春，平江不肖生离开上海，在孝感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部中校秘书，他要将启蒙现代性努力从小说宣传变为革命军事实践。他的两部武侠小说，皆于此时停止连载。当1931年平江不肖生勉强续完《近代侠义英雄传》时，他所能感受到的已是一曲无尽的悲

①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卷下，第574页。1903年，吴江金天翻发表《女界钟》一书，便署名“金一”，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金天翻也就是宫崎滔天（1871—1922）《三十三年落花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诗歌、散文及小说均有成就。

② 佚名：《要看小说最好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新闻报》，1922年3月9日。

歌，如《近代侠义英雄传》全书大结局所写：

奄奄一息的延到第二日深夜，可怜这一个为中国武术争光的
大英雄霍元甲，已脱离尘世去了，时年才四十二岁。^①

除了《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外，平江不肖生还撰有《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异人传》《现代奇人传》《半夜飞头记》《猎人偶记》《江湖怪异传》《烟花女侠》《双雏记》《艳塔记》《滴血神剑》，共13部。此外，他还参与制作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神侠金罗汉》《飞仙剑侠大破谋人寺（上集）》《飞仙剑侠大破谋人寺（下集）》《江湖奇侠》。其将武侠小说改编为电影，应该对时在香港撰写武侠小说兼编剧的金庸有所启迪。

与平江不肖生齐名的另一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于1923年5月由上海益新书社出版发行，影响较大。其他作品包括《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惊人奇侠传》《双剑奇侠传》《北方奇侠传》《双鞭将》《蓝田女侠》《说剑谈奇录》《边荒大侠》《不堪回首》《江湖侠义英雄传》《白剑莲影记》《奇侠平妖录》《尹氏三雄传》《昆仑侠隐记》《侠骨红装》《剑低箫声》。

另一重要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一生著有武侠小说36部，多达4000余万字，他与“悲剧侠情派”王度庐、“社会反讽派”宫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情推理派”朱贞木共称“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走出了一条与平江不肖生的启蒙现代性完全不同的道路，其“蜀山”系列^②以修仙的隐喻来探寻人如何解脱于身体欲望与历史欲望，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小说）想象力衰退以后，提供了“奇幻想象力与雄伟文体”的形而上

① 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下册，第390页。

② 蜀山系列包括：“蜀山剑侠正传”：《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后传》《峨眉七矮》；“蜀山剑侠前传容”：《长眉真人传》《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大漠英雄》；“蜀山剑侠别传”：《青城十九侠》《武当七女》《武当异人传》；“蜀山剑侠新传”：《蜀山剑侠新传》《边塞英雄谱》《冷魂峪》；“蜀山剑侠外传”：《云海争奇记》《兵书峡》《天山飞侠》《侠丐木尊者》《青门十四侠》《大侠狄龙子》《蛮荒侠隐》《女侠夜明珠》《皋兰异人传》《龙山四友》《独手丐》《铁笛子》《黑孩儿》《白骷髅》《翼人影无双》。其余还有：《万里孤侠》《黑森林》《虎爪山王》《血滴子大侠甘凤池》《征轮侠影》《力》《拳王》《黑蚂蚁》《酒侠神医》。

性与想象力。^①

以写实著称的北京作家老舍反复强调“五四”对他的巨大影响：“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五四’运动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②无疑，老舍以北平为背景的《骆驼祥子》，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以四季书写作为车夫的祥子的由生至死的过程未免仓促，而且对性之于祥子身体的摧残也过于夸张。然而，其同样以北京为背景的《断魂枪》，是老舍众多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关键在于一介武夫对世局之洞察而周围的人皆愚昧无所觉的悲凉，而且是绝妙的一篇具启蒙意味的短篇典范，要言不繁，既是武侠，又世俗，且又京味十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崛起于香港文坛的金庸，其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关键便在于他对司马迁在《史记》中“侠”的概念有所突破并作了具象的诠释。首先，他树立了“侠之大者”的崇高典范：萧峰、郭靖追随的是岳飞救国救民的英雄主义；杨过虽曾参与抗击蒙古，而精神大体上则近乎率性而逍遥的道家模式；张无忌被逼退隐，实为儒家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情侠结构，侠侣生死相随，彰显侠客“以武犯禁”的爱国勇气。

武侠小说之被排斥与边缘化，既中断了侠义观念的承传，又灭绝了江湖的想象。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之崛起乃有意识地对传统小说作出创造性的改造及发展，以对现代文学补偏救弊。金庸武侠小说在语言、结构、情节、描写等方面乃划时代的“革故鼎新”，一如黄宾虹之于山水画的改革与梅兰芳之于京剧的“革命”。^③金庸武侠小说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伦理，召唤良知，讴歌侠客，肯定爱情，批判虚伪，驱逐黑暗，这一切均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发扬，均乃“人的文学”的成功实践。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乃对“五四”以来以激烈反传统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摧毁传统人伦、文化的救赎。可以说是在废墟上想象传统，重建价值。

①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② 老舍：《老舍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卷，第346页。

③ 孙立川：《金庸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改造和发展》，刘再复、葛浩文、张东明等编：《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16页。

六、知识分子的被/再启蒙

1949年至1978年之间，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其中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昔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下放农村或放牛，或从事各种劳作，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梁启超曾所预期的“破坏”，成为现实，而结果却是如此的令人心碎、满目疮痍。邓小平复出并推行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也作出自我反思。启蒙话语权力和话语场域，因市民阶层的世俗价值观念的介入和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伤痕文学”是知识分子的自伤与自怜，而更为波澜壮阔的“寻根文学”则在方方面面深入民间，试图重建曾经被疯狂砸碎的传统。这些知识分子真正地接触到农村与农民，也真切地认识了乡村之野蛮与纯朴。故此，寻根小说有一股“五四”时期文学作品所没有的生命力与蛮荒气息。我们看到作家在各自曾经插队的地方，抚摸苟延残存的传统文化，愚昧与落后依然，知识分子或已洞悉昔日的启蒙角色值得质疑，乡野之气反而对带有种种傲慢与无知的知识分子作了精神的洗礼，或原始天地给予他们另一种模式的启蒙。

然而，猝不及防的市场经济的勃发却孕育了新写实的创作，知识分子在市民话语和世俗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对自身的启蒙价值观念进行了反思，知识分子以世俗的谦卑心态接纳小市民的价值观念。新写实作家池莉自白：

“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①

以池莉及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的作品所呈现的是，启蒙主体在世俗化大行其道语境中的尴尬处境，在反思启蒙话语和精英话语局限性的同时，也如鲁迅的自剖般将手术刀伸向自身。他们将启蒙价值观念的沦落处境和启蒙主体的内心失落通过原生态的叙事手段予以还原，并成为新写实

^① 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23页。

小说贯穿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在世俗价值观念的衡量下，知识分子的优越与高洁落得“一地鸡毛”，他们成为“再启蒙”的对象。在新写实小说中，传统意义的启蒙价值观念的衰落已成为常见的嘲弄对象。知识分子启蒙价值观念的沦落，不仅表现在民众对启蒙主体的漠视和嘲讽中，更表现在小说中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及所作所为以至于思想意识之中，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和异化，难以言说。

简而言之，政治批判与经济压力，彻底击垮了曾经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新写实小说对知识分子的揭露和批判，既是知识分子的自我鞭挞，无疑也是知识分子进入世俗的另一种启蒙。

七、章节安排

2019 年是新文学革命一百周年，无论是作为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中最为突出的启蒙思想，均有必要在学术上作一次全面的省思。此研究将“现代”与“当代”视作一脉相连的文学传统，故而有“呐喊”与“回响”的思路。本书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既有文本细读，亦有理论阐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既有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复详细地从社会、文化及语言的层面作出深入阐述。

第一章是为历史性地回溯清末至民国的启蒙思潮以及小说救亡的种种话语。第二章以鲁迅先生与日本的文学因缘揭开序幕，除了叙述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以及译介日本小说以启蒙国民的一番苦心，同时也可见鲁迅小说对战后日本的巨大影响。我们不应忘却巨匠昔日的锥心泣血，在当下研读鲁迅小说，仍能焕发新时代的意义。第三章复以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的叙事技巧，揭示三重世界中，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魂灵”叩问。第四章随之以现代小说的北方代表作家老舍的《断魂枪》作为短篇小说的典范，展示清末民初的武侠书写，此中包括老北京语言、服饰以及风俗习惯，关键是独醒者乃一介武夫，而非传统的启蒙者。继之，第五章以张爱玲的“小”说，乃“启蒙”之大我思想与日常“细节”与家庭的倾轨及情爱的算计与前四章互为观照，从另一角度审视张爱玲式的启蒙话语。第六章以“文本互涉”与传统考证方法，揭示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如何挪用

中、西文学之资源，而在侠的义涵的多元化的拓展之外，金庸笔下的武侠如何回应清末以来对武侠的家国情怀诉求及其所呈现的忠贞节义，而儒释道多元文化的融入武功，则更进一步地形成其武侠小说的创造性之所在。第七章以寻根小说的理念及其实践的论述中则详细而深入地阐述传统文化的根及其韧性，这是一代人的省思。而第八章则以新写实小说中，呈现在市场经济冲突底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及面貌，以及个体的卑微与无奈。

第二章 启蒙之光，中日互动： 鲁迅与日本的文学因缘

一、前言

青年鲁迅“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①寻求救民的道路。然而，幻灯片事件与日本学生对其考试成绩的质疑所造成的思想刺激，终于促使他弃医从文。显然，留日期间既是其开阔眼界与吸收各国文化的黄金时光，而种种不愉快的经验却益坚定其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与探索。自从《狂人日记》发表以后，日本学界第一时间予以热情的推介，复有对其小说与学术的译介，从不间断。由此，日本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上作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其文坛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可谓有莫大的功劳。同样，鲁迅亦译介了日本小说，传播了当时日本的启蒙思想，并糅合日本小说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元素至其小说创作之中。以下将从三方面作出论述：一、日本学界对鲁迅小说创作推介的关怀所在；二、鲁迅所译介的日本小说与思想著作，如何配合其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三、日本小说及有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具体影响。

二、留日期间的革命行动

要了解鲁迅的启蒙思想，必须了解几段有关他在日本期间对革命的渴望与参与的记载。

1903年3月31日，邹容、陈独秀等因江南班监督姚文甫有奸私，便“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②邹容在1903年便敢于撰写《革命军》，后来死于监狱。而陈独秀

①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5页。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210页。

当时竟然也有此激烈行动，其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就顺理成章了。鲁迅后来曾把自己剪辫和姚文甫的事综合进小说里：“我……剪掉了辫子……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① 辫子之去留，在当时乃一件大事，关乎民族立场，亦关乎思想之进步与否。鲁迅对辫子自有其亲身经历与愤慨，在小说或杂文中亦花了不少的文字作描写与讨论，可见刺激之巨大。三百年前留辫子是为汉奸，三百年后剪辫子，一般人又以为是汉奸。由此可见，其时民智之低下。

1905年3月13日，仙台医专因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而召开祝捷会。在这前后，学校于坡形教室放映幻灯片。当中有一幅画的是日本人杀中国人，因为据说被杀者给俄国做侦探；而围观的则是一群愚昧麻木的中国人。^② 这给鲁迅很大的刺激，此乃产生要以文艺改变国人精神，并开始考虑中止学医等问题的直接原因。学医自是鲁迅的成长创伤，其父亲的病亦成为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隐喻，“救父”如救国，痛恨中医，激烈反传统，肇始于此。

1905年3月31日，第二学期结束，鲁迅动身返东京度假，半途下车，前往瞻仰朱舜水墓。朱氏反抗清廷，百折不挠，最后死于日本，当时应该是一众在日本怀有革命思想者的精神偶像，对于充满革命激情的鲁迅更不必说。

由以上数则关于鲁迅在日本的活动资料可见，其革命思想正在此际萌芽，从行动而至思想上的求索，以至于其未来的事业方向，也渐露端倪。

当年9月，鲁迅从东京回到仙台。这时，学年的成绩已经公布，在142人中鲁迅名列第68，平均分数为65.5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为59.3分。大约9月间，鲁迅收到一封很厚的信，一开头就是“你改悔罢”，“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③ 按：“你改悔罢”，这本是《新约》中的话，托尔斯泰在写给俄国和日本天皇的信里把

①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63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③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05页。

这句话引了进去。该信发表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日本《平民新闻》约在8月间转载。日本的一些学生以这来讥讽鲁迅考试前已知道题目，必须“改悔”。^① 这使鲁迅感到沉痛而悲愤，民族的昏昧与国家的衰弱，才招此蔑视。

三、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就把“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归咎于“精神沦亡”。^② 此际，鲁迅撰写了一生中最长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全面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英国的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彭斯（Robert Burns），俄国的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波兰的密兹凯维支（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裴多菲（Petöfi Sándor）等诗人，阐扬了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精神。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是试图以文艺作为疗救国民宿疾的手段。直到1925年他还明确指出：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
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③

他自己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 他明确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他说：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⑤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的日记都对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作了评论，他从“博观和内省”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人总不

① 蒙树宏：《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②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③ 鲁迅：《致许广平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⑤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4页。

肯研究自己”。^①以改造国民性作为救国之道，这是最基本且是最为关键之处，毫无疑问此举在扫除革命的重大思想障碍上，乃自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来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创举。

许寿裳回忆了他们研讨“国民性”的最初情景：

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②

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的鲁迅就认为，对于中国，“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③

欲立人，鲁迅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即《破恶声论》中论及的“内曜”与“心声”：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黯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④

“内曜”，即人之内心光亮明彻，通明洞悉。他认识到：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326页，第333页。

②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9~60页。

③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60页。

④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3页。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这一认识促使他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②。他甚至主张牺牲群众以发扬少数“英哲”“超人”“天才”的个性，“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③“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其首在立人”。^④他盛赞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等摩罗诗人，也是为了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唤起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⑤

此际，日本的几位思想家无疑成为鲁迅最直接的精神导师。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有名言曰：“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植木枝盛继承了福泽氏的这一著名纲领，并进一步提出：

国家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如果人民各有自主独立的气质，发挥智慧，修养德义，专心业务，破除自卑之心，精神焕发，全心爱国，相亲相爱，团结一致，国家就不会不强，不会不盛。^⑥

福泽谕吉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然而，不得不提的是福泽谕吉也是日本侵华的最早期的鼓吹者之一，其侵华的具体设想在后来全部实现。

在文艺方面，影响鲁迅更深的是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鲁迅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②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③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2页。

④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第57页。

⑤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⑥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2版，第1卷，第75页。

在《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说，厨川白村“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① 收载在《鲁迅译文集》中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厨川白村原著的前三篇（第一篇是《出了象牙之塔》，第二篇是《观照享乐的生活》，第三篇是《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以第一篇而论，其中七至十四节以及十六节都是对日本国民缺陷的攻击，鲁迅认为这是厨川白村对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以至于禁不住称快。^② 他特别钦佩厨川白村“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③ 以为这样的批评家在中国是不容易存在，还说“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为什么旁观他人“鞭责自己”，而“痛楚”却又仿佛“到了我的身上了”呢？^④ 因为——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中国。^⑤ 厨川对于日本的爱，多数时候是以批判与讥讽的声音来表达的，这也很投合鲁迅的习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爱，也多半是以批判与讽刺来表达的。^⑥

除却厨川白村之外，鹤见祐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也因其对“国民性的观察”多有“明快切中的地方”，^⑦ 而受到鲁迅的推崇。鲁迅希望就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与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译介于中国的读者，促使反省，或“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⑧ 以攻中国国民的瘤疾。

鲁迅这样审视与比较中、日这两个有渊源与同样的民族危机的国家，在当时面对西方威胁的不同反应：

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

① 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231页。

②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2页。

③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2页。

④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3页。

⑤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2页。

⑥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⑦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2页。

⑧ 鲁迅：《〈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1页。

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①

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讲到了他的孩子因为健康和活泼而被同胞误认作是日本孩子。由于照相师的不同，同一孩子在日本照相馆照的相满脸顽皮，像日本孩子，在中国照相馆照的相，便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② 由此鲁迅悟出：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③

他在《禁用和自造》以中日对待铅笔和墨水笔的不同态度的比较，作出结论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④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民渐醒，国力渐强，然而直至1925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27年的中国，烈士牺牲了，国民性依然没改变：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⑤

鲁迅慨叹说：

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⑥

①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3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81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82页。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第316页。

⑤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

⑥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1页。

然而，直至1925年，鲁迅还是在强调：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①

他在1925年2月12日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1925年2月16日甚至感叹：“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②足见其对国家的爱之深、恨之切。

四、日本学界对鲁迅著作的译介

1909年5月的《日本和日本人》“文艺杂事”栏目，就已记载了关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世界文学选集《域外小说集》第一卷的刊行，可谓世界上最早介绍鲁迅的文章，也是鲁迅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开端，但这只停留在介绍的层面。最先在日本介绍鲁迅的是后来的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Aoki Masaru），其《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浪潮》发表于（载《支那学》一卷1—3号）1921年9—11月，从文章的题目看，是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然而该文的最后却写道：

在小说戏曲方面，没有比得上胡适的人。在翻译方面，周作人作为近代大陆文学的介绍者，成绩是很大的。他的译笔不是囿于旧文明的直译体，而是更能体现原著的神韵。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一个有恐怖幻觉的迫害狂者，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了。

刊载青木正儿文章的《支那学》到了胡适手中，^③胡适附上信寄予鲁迅。

①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2页。

②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第17页。

③ 1919年青木正儿与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小岛佑马、本田成之等组成“丽泽社”，创办《支那学》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此乃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人物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多次向胡适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国文学史资料。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提及此事。见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62~163页。

鲁迅给青木正儿的回信中有以下文字：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①

以上引文的意义在于，当时鲁迅的自谦或忧虑证明是错误的，其作品与影响在中、日两国，随时此际的萌芽，自此迸发，在两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真正意义上的鲁迅作品的日译，始于1922年5月4日发行的日文杂志《北京周报》刊登了《孔乙己》的日译版，译者是仲密，即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932年1月《北京周报》刊载了鲁迅本人翻译的《兔和猫》和《中国小说史略》的前半部分。日本人最初的译介，是从1924年1月到11月，在《北京周报》第97—137期上连载的丸山幸一郎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

在12月21日那一期上，刊出了东方生翻译的鲁迅的《我的头发》。

同年，该杂志连载了清水安三（Shimizu Yasuzo）的《现代支那文学》一文，有关鲁迅的条目刊登在3月2日上。^②在武者小路实笃（Saneatsu Mushakoji）编辑的《大调和》1927年10月号上，译载了《故乡》。这是日本国内对鲁迅作品的最初翻译出版。1928年，《上海日日新闻》刊登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阿Q正传》。在日本国内，井上译的《阿Q正传》，1929年11月在文艺市场社以《支那革命畸人传》的名字发表。

日本方面，1926年大连日中文化协会出版的日文杂志《满蒙》，刊登了由井上红梅翻译的《狂人日记》。井上红梅是日本第一位积极译介鲁迅作品的翻译家。他很早就发现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因此，不局限于某几篇小说，而是几乎对鲁迅所有作品都很感兴趣。1927年12月，他在《上海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4页。

② 清水安三曾将自己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对清水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然后对日本古今的汉诗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日本人做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此事让清水安三久久难以忘怀。一般史料认为，日本译介鲁迅始于山上正义的《论鲁迅》，其实清水的研究要比这早七年，在时间上堪称向日本译介鲁迅的第一人。

持论》发表了《在酒楼上》；1928年，又发表了所译的《风波》《药》《社戏》《阿Q正传》。《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8年《上海日日新闻》上，1929年又更名为《支那革命畸人传》，载于日本国内一本以猎奇为主旨的月刊《奇谭》上。鲁迅对这位“中国风俗史研究家”的翻译并没有好评，1932年11月7日在给增田涉的信中，就表露出对井上红梅的不满。他说：“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是无可如何。”^①在1932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②

1928年，山上正义（林守仁）翻译的《鸭的喜剧》，镰田正国译的《白光》和《孔乙己》也相继在日本问世了。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译作情况，主要集中在对鲁迅单部作品小规模的介绍上，水平参差不齐，对鲁迅原文的理解还可能存在偏差，并没有在日本社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日本学界由此开始关注鲁迅及其作品。从形式上看，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多家杂志社对鲁迅的译介，客观上带动了日本国内对鲁迅翻译的热情，为接下来鲁迅在日本译介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初谈到有关《阿Q正传》的文章是山口慎一的《支那的新小说二三》。在《满蒙》12卷1号（1931.1）上，刊出了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阿Q正传》于同年5月连载完），同时刊载了大内隆雄的《鲁迅的时代》。

鲁迅在1933年11月5日寄给翻译家姚克的回信中，对自己作品的外文翻译情况做了如下说明：“《小说全集》，日本有井上红梅（K. Inoue）译。《阿Q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珪三（K. Matsuura）译，（二）林守仁（S. J. Ling，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译，（三）增田涉（W. Masuda，在《中国幽默全集》中）译。”^③在鲁迅致外国友人的书信中，其致增田涉的书信占了大约七成，可见他对增田涉的信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猝然离世，日本文化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因此决定马上出版鲁迅全集。1936年至1937年，东京改造社集合了当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501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43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7~258页。

时鲁迅作品翻译的代表人物，如井上红梅、松枝茂夫、佐藤春夫、山上正义、增田涉、鹿地亘等人，合力完成了7卷《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出版。这套译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情况，乃20世纪30年代鲁迅著作外文译本中收录最为详尽著作。上述译著的出版，迅速提高了鲁迅在日本的知名度。

战后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面临巨大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的文化圈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曾经遭受长期西方列强殖民统治、同为东方语境中的中国，他们体验到了“被压迫民族”的悲哀，并且对鲁迅的作品中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充满了共鸣。戒能通孝所说的话，颇能传达当时的氛围：

最近我读鲁迅小说，感到非常之有趣，这实在是令人为难的事……鲁迅写的是中国，那中国是在与我们社会不同的地方……但现在却完全相同了……评论的语言从前是他人的语言，现在却正变成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日本完全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①

很多日本人惊奇地发现，美军占领的五十年代的日本与鲁迅笔下三十年代的海上是如此相像。他们再次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以此希冀能找到解脱之路。正是这种切身的需求令战后日本再次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热潮，在五十年代达到高峰。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更促进了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热烈研习：

1952年是特殊的年份，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结束，战后日本非常畸形地恢复了独立国状态。这一年，美军刚退到幕后不久发生了“五一”事件。这是战后首次的五一活动，并对不完全讲和的独立表示抗议。据说全国有一百万人参加，东京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尤其在东京，因为警察不许在皇宫前广场开会，群情激愤，会后很多人闯进皇宫前广场，跟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受到镇压，死了两个人（其中一名被击毙），受伤者达到一千五百多名。公

^① [日] 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第54页。

安部门宣布此事件为“骚乱罪”，逮捕了一千二百多人。左派人士为了表示抗议并宣泄愤怒，事后援用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词语，用北京的“三一八”事件来比附，表示抗议。但是东大中文系的一部分左派学生的看法，跟社会上的左派不一样。他们认为摘引鲁迅的句子来宣泄自己政治性的愤怒，是不科学的、不应该直接套用到1952年的日本，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式来研究鲁迅，不能跟着社会上政治运动的路子走。就这样他们组织“鲁迅研究会”，展开了认真的阅读。每周，后来是每个月开会，精读鲁迅。一篇文章，一句话一句话阅读。不明白的词语，不清楚的社会背景，一个一个查清楚。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鲁迅研究》（1952—1966年）。^①

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没有令日本人排斥鲁迅，反而将鲁迅视作为日本当时的危机的启蒙导师，值得赞扬。

根据藤井省三先生《鲁迅在日文世界》记载，1946—1949年期间“鲁迅译本等”为两部，1950—1959年期间则上升至35部；“鲁迅评论、传记等”在1945年前仅为2部，1946—1959年期间飞跃到26部；介绍鲁迅的杂志文章也从1945年前的0篇激增到1946—1959年期间的149篇。^②此阶段翻译鲁迅作品的学者包括：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鹿地亘、小田岳夫、冈崎俊夫、小野忍、武田泰淳、中泽信三、佐藤春夫、斋藤秋男、丸山升、太田良夫、香阪顺一、近藤春雄、中泽信三、田中清一郎、金子二郎、小田岳夫、本隆三、尾阪德司等等。

1970—1989年期间，鲁迅作品的“译本”共计61部、“评论传记”共计64部、杂志文章共计298篇，数量惊人。^③而这一时期的“译本”在

① [日] 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第50页。

② [日] 藤井省三：《鲁迅在日文世界》，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29页。

③ [日] 藤井省三：《鲁迅在日文世界》，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第222~229页。

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各有特色的。像 1970 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第一卷中便收入了竹内好翻译的鲁迅的主要作品；筑摩文库七十年代出版了竹内好个人翻译的《鲁迅文集》全 6 卷；五个出版社全新出版了鲁迅小说文库本，包括 1970 年旺文社文库出版了松枝茂夫翻译的《阿 Q 正传》《狂人日记》，1971 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了由高田淳翻译、注解的《鲁迅诗画》，关注于鲁迅古典诗的研究；1972 年潮文库出版了田中清一郎翻译的《阿 Q 正传》《狂人日记》；1973 年中公文库出版了高桥和已翻译的《呐喊》；1975 年新日本文库出版了丸山升翻译的《阿 Q 正传》；1979 年讲谈社文库出版驹田信二翻译的《鲁迅作品集》；1977 年而立书房出版了由霜川远志编著的《戏曲·鲁迅传》，尝试将鲁迅作品戏曲化。此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乃由学习研究社 1984 年至 1986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共 20 卷。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岩波书店、平凡社、讲谈社等大规模的出版社不仅刊载日译的鲁迅作品，而且引进中国的原作。《阿 Q 正传》《药》《藤野先生》等代表作也不断反复地被翻译和出版，但是相较于“评论传记”“杂志文章”呈现出的活跃状态，译本已经趋于稳定。而 1990—2010 年期间，有关鲁迅的“译本”共计 21 部、“评论传记”共计 78 部、“杂志文章”共计 687 篇。^①

鲁迅留学于日本，弃医就文亦在日本，他前期的思想、创作同日本文学具有密切联系，而译介并推崇鲁迅的文学作品及其领导地位的，亦是日本。此处只是指出日本对鲁迅逝世后的翻译成果，这阶段的日本翻译对鲁迅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与国际文学界的地位，功莫大焉。日本的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历史悠久，数量与种类繁多，足见鲁迅思想之魅力，历久不衰。

五、鲁迅译介的日本文学与思想

鲁迅愤世嫉俗，对于国家更是爱之深而恨之切，然而对于令其百味交

^① [日] 藤井省三：《鲁迅在日文世界》，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第 222~229 页。

集的日本却颇多推崇，他如此赞美日本：

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①

日本对鲁迅的文学及学术有翻译与推介之功，而同样鲁迅亦很有目的地翻译并传播了当时日本先进的启蒙思想与小说作品。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思想及作品中的启蒙思想的主要源头，便是来自当时的日本思想家与小说家。1919年他着手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1923年他与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15人共30篇作品。其中鲁迅所译的有：夏目漱石的《挂幅》与《克莱喀先生》；森鸥外的《游戏》与《沉默之塔》；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的《与幼小者》与《阿末之死》；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与《罗生门》；菊池宽的《复仇》与《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江口涣的《峡谷之夜》等6家计12篇作品。此书由胡适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芥川龙之介亦在《日本小说的汉译》中对此书作了介绍。有论者指出：

这个翻译小说集……其中有些作品，如芥川龙之介、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不惟是这些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早期介绍，而且更重要者，是这些作品展示出当时中国新文学从未见过的文学品格与文学追求，那是非常个人化的文学趣味。这种个人化，其实亦透出一种现代品格。^②

鲁迅曾谈到他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

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③

他颇为赞赏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原作对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亵渎的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尽情嘲讽。鲁迅在《译后记》里指出，“武

①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78页。

②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第66~67页。

③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页。

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菊池宽敢于揶揄和揭露，“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①

鲁迅所译介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此乃尼采《察拉图斯武拉》（或有时作《扎拉图斯武拉》）日译本的“代序”。^②他认为“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却仍推崇他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③他在翻译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后记中说：“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④他认为“永久的和平”“非从民众觉醒不可”，^⑤其翻译无疑又是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紧密联系的。

六、日本文学与鲁迅小说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对封建的“吃人”社会提出异议、进行反抗的、有觉悟的人。（这个狂人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近代的自我”的觉醒）在日本相当于《狂人日记》的作品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与“狂人”相反，《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却是一位“既缺乏生活能力也缺乏果断”的懦夫。但是他不顺从明治社会（他是某部的小官吏，后被免职），这点可以说与“狂人”一样，对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二叶亭四迷是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爱读19世纪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这可以使人想到也许他想在日本塑造一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不满现实却无能为力的“多余者”的形象。《浮云》问世后3年，即明治23年，森鸥外发表了用拟古文撰写的小说《舞姬》。这篇小说用笔记的形式写，主人公在德国留学期间与名叫爱莉斯的“舞姬”（舞女）相恋直至同居，但是为了在故国能飞黄腾达，抛下爱莉斯回国了。他在无穷的烦恼中，写下了这个笔记。鲁迅的《伤逝》或便是受《舞姬》的启发而创作。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第229页。

② 森鸥外撰写此文不单为了介绍尼采的思想，他是针对1910年日本残酷迫害无政府主义党人的“幸德事件”而发的，带有对日本军阀政府的抗议之意。

③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四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第333页。

④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5页。

⑤ 鲁迅：《译者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2页。

江口涣的《峡谷的夜》，描述一个被丈夫遗弃后发疯的妇女，颇近《祝福》中被伦理纲常与迷信逼疯的祥林嫂。菊池宽《复仇的话》的主角八弥是一位武士的遗腹子，为报杀父之仇，仗剑寻敌，远游异乡。《复仇的话》中的某些情节和鲁迅的《铸剑》有不少类似之处。

鲁迅还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此小说以日本民间传说为题材，运用典雅诙谐的笔调，尖锐地讽刺了现实中那些安于现状、保守成性的人。明知弊端，习以为常，一旦破除旧习，反而不惯，宁可因循守旧，复归故道。显然，这也是中国国民的弱点。鲁迅曾痛心指出：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①

对此，他沉痛地慨叹：“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②可见，他翻译《鼻子》的用意亦在于期望改造中国国民的病疾，打败因循守旧的落后现状，启发国人的自觉。这种创作意图，大体出现在《头发的风波》中，有关国民对剪辫子的不习惯的描写。

鲁迅所翻译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末之死》，对其小说创作亦有一定影响。有岛武郎是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以博爱为宗旨，从生物进化发展观点出发，提出解放下一代，大力鼓吹长者对幼小者的爱，主张长辈要不惜牺牲自己，以爱和温暖抚慰幼者。“五四”时期，鲁迅多次阐发人性进化和解放，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不满于国民性的痼疾，故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他深信“青年必胜于老人”，新一代必然超越过旧的一代。1919年10月，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要“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尖锐地批判了以封建纲常为伦理的父权。鲁迅认为父辈应该乐于牺牲自己，为青年一代开路。他大声呼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③鲁迅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天，读

① 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

② 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43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40页。

到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便挥笔写下《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称赞有岛是“觉醒者”。^①于是乎，《故乡》中便有寄希望于侄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狂人日记》中便有“救救孩子”之呼吁。

七、结语

鲁迅他揭露“吃人”的中国历史，发出“疗救的注意”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其途径唯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②“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③

昔日，鲁迅离家去国，远渡日本，其在日本所受的刺激及启蒙，令他立志走上文学家与思想家的道路，而料想不到的是其作品及思想又反馈于战后的日本，以促其自新、自强。在日本，鲁迅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蒙，同样日本亦曾接受鲁迅思想的启蒙。可以说，中日两国共同孕育并成就了大写的“鲁迅先生”，亦为现代中国小说开启了一条启蒙大道。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363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209页。